

● 中青文库 ●

传统思想与现代诠释

刘国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青文库 ●

本书得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传统思想与现代诠释

刘国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思想与现代诠释/刘国民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61-0558-0

I. ①传… II. ①刘… III. ①哲学思想—中国—文集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6088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64073836(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374 千字		
定 价	6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青文库》编辑说明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是共青团中央直属的一所普通高等学校。它于1985年12月在中央团校的基础上成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了包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继续教育和团干部培训等多形式、多层次的教育格局。与其他已有百年历史的高校相比，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进入国民教育序列的历史还显得比较短。因此，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浪潮中，尽快提高学校的教学与学术水平就成为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关键。2002年，学校制定了教师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条例，旨在鼓励教师的个性化研究与著述，更期之以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的精品涌现。出版基金创设之初，有学术丛书和学术译丛两个系列，意在开掘本校资源及域外精华。随着年轻教师的剧增和学校科研支持力度的加大，2007年又增设了博士论文文库系列，用以鼓励新人，成就学术。三个系列共同构成了对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多层次支持体系。

8年来，学校共资助教师出版学术著作近百部，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管理学、新闻与传播等十多个学科。学校资助出版的初具规模，激励了教师，活跃了校内的学术气氛，并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2010年，校学术委员会将遴选出的一批学术著作，辑为《中青文库》，予以资助出版，一则用以教师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二则希冀能以此为发端，突出学校特色，渐成风格与品牌。同时，为了倡导并鼓励学生关注社会，重视实践，寓科学研究于专业学习之中，文库还将学校长期以来组织的“智慧星火——中青学子学术支持计划”中的学生获奖作品辑为两本，一并收录在内。

《中青文库》编辑说明

在《中青文库》的编审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人员认真负责，用力颇勤，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处

2011 年 11 月

自序

这 20 篇文章，都是作为独立性的论文来写作的，所以存在某些材料和论点的重复在所难免。虽然文章的内容各不相同，但皆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从解释学的角度展开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诠释。

前面的 4 篇文章，是我博士论文所研究的课题，主要是运用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分析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董仲舒之经学诠释的一般特征是主观性强，所谓“过度诠释”；经典之义具有开放性，所谓“《诗》无达诂”。他之解释目的：一是建构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为其思想体系建立经典的根据；二是论证大一统皇权专制政治的合理性，且通经致用，以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问题。他的解释根据（意义生成的根据）是“间距化”：一是《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深层义的“间距化”；二是《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是《春秋》之常与变的“间距化”；四是《春秋》本义与《公羊传》所阐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是解释的障碍，是误解的原因；但也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和生产性的要素，能使诠释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董仲舒经学解释的较强主观性，与他在解释过程中张扬的主体性有关；而其主观性、主体性的突出，又与他标举的解释方法相联系。他的解释方法之一是“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春秋》有“微言大义”，微言与大义之间有间距，解释者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突破文辞字面义的限制，以把握深微的《春秋》大义。其解释方法之二是“推见至隐”，《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不合，即“讳”，讳背后的事实真相及其意义隐约幽微，故要推见至隐，“具见其表里”（《史记·封禅书》），突破表面的事而深及其里。其解释方法之三是“原心贵志”，特别重视追及一个人之行

为动机的隐微之地。

中间的7篇文章，是我现时正在着力研究的课题。新儒家徐复观（1903—1982），是港台治中国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他生活于20世纪最为动荡的中国，曾置身于国民党政治权力的上层。20世纪50年代，他毅然与现实的政治决绝，走进大学，归心学术，最终成为新儒家的重镇。徐复观怀抱着一颗由动乱时代所激发出来的“感愤之心”，铭记其师熊十力之言“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对民族思想文化所面临的困境怀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立志通过救中国文化来救中国。他的《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两汉思想史》（卷一，卷二，卷三）、《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中国文学论集》、《中国经学史的基础》等著作，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展开了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现代诠释。其一，徐复观的学术性格是由古典的注释走向思想史的把握，由书本走向现实的社会、政治和人生。其二，徐复观在解释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时，不仅建构他们的思想体系，而且从他们的时代背景、学问传承、人生遭遇和个性人格，揭示其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古代思想家之抽象的思想与其时代背景、人生遭遇和个性人格内在地结合起来，他们之活生生的人与活生生的思想构成了“立体的完整生命体”。其三，徐复观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怀有一种深厚的感情，他深入发掘文化传统中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他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解释，不仅是事实的描述，也是一种价值的认同，即他把传统思想文化当作自己安身立命、修己治人的价值系统。其四，徐复观的解释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深刻地揭示出二千多年来专制政治的基本特性，对专制政治的挞伐不遗余力。他认为，在中国的过去，政治中存有一个基本的矛盾问题，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政治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这种二重的主体性便是无可调和的对立。其五，徐复观的解释富有创新性。他的许多观点与传统乃至时下的说法不同。这来自于他顺着材料自身而归纳和概括出来的；来自于他以逻辑为导引，以自己的思想为基础，以社会、政治和人生的问题为验证。

接下来的2篇文章是专门论述陈鼓应先生对老庄之仁义礼的解释。陈鼓应认为，在一个大道流行的完美状态中，仁义礼本就蕴涵在大道里，行仁由义是自然自得自适，如“鱼相忘乎江湖”；因此，老子、庄子不仅不排斥仁义礼，

反而对仁义礼采取肯定的态度；老庄批评的礼是流于形式而虚伪的异化之礼。根据陈先生的观点，道家的道德与儒家的仁义道德没有实质的分别。这种解释遮蔽了老庄的真正观点：在大道流行的理想状态中，根本不存在仁义礼；理想状态崩坏而大道废弃时，才迫切需要仁义礼来救治，仁义礼是衰世的产物，背离大道之真实、质朴、虚静的特性，因而予以否定。我的父母弟妹皆生活在穷困的乡村。平时，如果没有紧要的事情，我们各自忙各自的，没有往来，彼此相忘自由而不施行孝悌慈爱。一旦父母弟妹在农村陷入困境，我们就不能够相忘了，电话不断，来往频繁，迫切需要孝悌慈爱来救助和爱护。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是我硕士论文所研究的问题。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史记》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有待于阐释。根据哲学解释学的观点，文本没有一元性的原意，文本的意义有多元性和开放性；解释者不是被动地复制文本的原意，而是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文本的意义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文本常释常新。这肯定了解释者在解释文本过程中的能动性、创造性。解释者总是结合他自己的时代经验、思想情感、个性人格和人生遭遇，而展开对司马迁《史记》的解释。解释者“突出”文本的某种意义，一方面是文本蕴涵这种意义；另一方面是解释者有这样的先见、前见，“突出”的内容正是解释者感受最深、理解最透的，故不遗余力地予以发挥，陶渊明所谓“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哲学解释学所谓“视域融合”：解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相融合，一方面是解释者的思想向文本的渗透；另一方面是文本影响了解释者的思想，二者互动的、双向回流的解释活动创造了文本的意义。在《史记》的解释中，司马迁之坚强不屈的品格、“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求知精神、幽怨的情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幸命运，深深地影响着我，有的已内化到我的生命当中。港台著名学者牟宗三说：“生命之学问，总赖真生命与真性情以契接。无真生命与真性情，不独生命之学问无意义，即任何学问亦开发不出也。”（《才性与玄理》“自序”）

最后的几篇文章主要侧重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解释。文学以真挚的感情打动人，情感是美丽的；哲学以精深的思想启迪人，思想是美丽的。情感之美与思想之美相融合。闻一多先生说：“并且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的，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只有浅薄的、庸琐的、渺小的文

学，才专门注意花叶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宝贵的类似哲学的仁子。”（《庄子》）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从“大文学”的同一状态中觉醒过来而逐渐显现自身之独立价值的过程，所谓个体化的过程。一是文学力量的成长过程。文学在此过程中总是受到哲学（经学）、史学的限制，如过分突出文学的美刺目的即是受到经学的影响，排斥文学的想象和虚构是受到史学求真、求实的制约，因而文学在发展中产生了突破限制以完成自己的需要。二是文学的孤独感逐渐增强的过程。当文学的个体化达到较高的程度时，文学自身的独特价值获得了充分而自由的展现，但文学也失去了与哲学、史学的联系，从而表现出片面化、孤独化的倾向。文学在面对自身与其他学科的分离及由此而来之强有力的冲击和威胁时，又会产生放弃自身特质的冲动，试图把自己融合在哲学、史学当中，以克服其孤独感和软弱感而找到归宿和安宁。因此，在当今文学的个体化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时，文学希求回到大文学的观念当中，实在是文学自身的必然要求。《时间性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意展现》一文，即是在文学作品中追问哲学之时间性的问题。自然和人事的变迁，是时间存在的前提和根据；时间是统摄过去、现在、将来为一体的，这一方面表明三者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展示其变异性；将来包含着可能性的意蕴，具有优先性。我们的时间意识总是基于现在，而展开对曾在逝去的伤怀与对将来的筹划当中。时间的本质揭示了时间流逝与自然和人事变化的内在联系，把时间流逝与主体心灵及其生活经验、生命体验结合起来，从而蕴涵着丰富的、活生生的内容。

1997年9月，我带着一身的泥土，卑怯地从农村的一个中学，来到湖北大学，跟从何新文教授攻读古代文学的硕士学位。2000年9月，我又战战兢兢地来到首都师范大学，跟从赵敏俐教授攻读古代文学的博士学位。六年的学习生活，使我走上了学术研究的路途。我的两位导师出于爱护之深和希望之切，严格地要求我，这是我今日能取得一些成果的重要原因。2003年7月，我来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工作。八年多的教书生涯，使我坚信这里就是我的人生归宿，“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陶渊明《饮酒》）。我真诚地感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直以来对我的关爱和帮助，真诚地感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对本书出版的资助。我深知，个体是渺小的，目前我得到的一点成绩和声誉，只是偶然的幸运。因此，个体在学术研究与为人处世中要始终保持“敬”的态度。敬

是贯彻于道德活动与知识活动中的共同精神状态，是一种负责、谨慎、凝敛、反省、贯通的精神状态。黄勉斋在《朱熹行状》中称赞朱子说：“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

本书是我十多年以来学术研究的一些成果，虽得之不易而敝帚自珍，但并没有“文章千古事”的要求；它也许不过是一片历史中的云烟，将随着时空的迁逝而归于寂灭。唐人崔颢诗曰：“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这不能不令人感慨伤怀。王维《孟城坳》曰：“新家孟城坳，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人生如寄，来去匆匆。昔人之有，今日已无；今人之有，将来亦将归无。将来之人何必悲今人之所有呢？今人亦何必悲昔人之所有呢？

目 录

自序	(1)
一 “以义传经”	
——《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	(1)
二 “过度诠释”	
——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目的	(21)
三 “间距化”	
——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	(38)
四 “推见至隐”	
——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方法	(57)
五 “立体的完整生命体”	
——徐复观解释中国古代思想的方法	(77)
六 “思想史上的伟绩”	
——徐复观对刘安及其《淮南子》的解释	(97)
七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	
——徐复观对《史记》的“突出”解释	(113)
八 “学术文化是在政治的上位”	
——徐复观对《史记》的“突出”解释	(131)
九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	
——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145)
十 “重知识不重伦理道德”	
——徐复观对王充哲学思想的解释	(166)

十一	“德治”即“无为之治”	
	——徐复观对儒学之民主精神的发明	(187)
十二	“大道废，有仁义”	
	——论陈鼓应对老子之仁义礼观的解释	(204)
十三	“人相忘乎道术”	
	——论陈鼓应对庄子学派之仁义礼观的解释	(219)
十四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艰难抉择	
	——汉代三篇“设论”赋的解释	(232)
十五	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	
	——司马迁对法家人物悲剧命运的解释	(248)
十六	“史有诗心”	
	——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的分别	(264)
十七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	
	——论建安诗文的“迁逝”之悲	(285)
十八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论时间性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意展现	(303)
十九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从禅宗的内在超越性解释妙玉的悲剧命运	(319)
二十	“天地之逸气，人间之弃才”	
	——论贾宝玉的“名士”人格形态	(336)

一 “以义传经”

——《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

根据《春秋公羊传注疏》，《公羊传》为汉人公羊寿所著。公羊寿是文景时期的学者。《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曰“名高”。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① 这表明，《公羊传》在公羊寿、胡毋生之前是口授单传，到公羊寿才著之于竹帛而成书。戴宏之说实不可信，一是《公羊传》约有二万七千多字，仅仅靠口头上传授，是不可能的事情；二是胡毋子都与董仲舒同治《公羊传》而不相师，说明《公羊传》早已写定成书，而传习者非一人。港台著名学者徐复观认为，《公羊传》并非是汉人公羊寿著于竹帛，“则此传之成立，合理的推测，应当是孔门中属于齐国这一系统的第三代弟子，就口口相传地加以整理，记录了下来，有如《论语》成立有《齐论》、《鲁论》的情形一样。先有了这样著于竹帛的‘原传’，在传承中又有若干人对‘原传’作解释上的补充，被最后写定的人，和‘原传’抄在一起，这便是汉初《公羊传》的共同祖本”，公羊寿不过是补充解释者之一。^②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初传承《公羊传》的共有两家。其一是董仲舒，“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其二是胡毋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

① 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② 徐复观：《汉代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公孙弘亦颇受焉”。武帝时，朝廷推重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朝廷重视公羊学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公孙弘传承公羊学，他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因而凭借其政治权势以推重《公羊传》；二是公羊学专讲《春秋》的微言大义，以经世治国，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有重要的意义。董仲舒其人、其学及其弟子皆受到朝廷的重用，《史记·儒林列传》：“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汉书·儒林传》：“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而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孟为符节令，坐说灾异诛，自有传。”胡毋生与董仲舒各治《公羊春秋》，皆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胡毋生比仲舒年长，仲舒非常尊重他。他们不是师生关系，也不是同授于一师的同学关系。^②

（一）

《公羊传》是以比较完整的经典注释形式解释《春秋》的，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按顺序逐条解释经文，从隐公元年始，至哀公十四年止；但《公羊传》并不是对《春秋》所有经文加以解释，《春秋》经文总数约有1870条，《公羊传》解释的约有570条，有经无传的有1300余条。其次，《公羊传》没有无经之传。这与《左传》不同，《左传》有些重要的记事不见于《春秋》。有的学者否定《左传》为解经之作，即以此为理由之一。^③再次，《公羊

① 《史记·儒林列传》“广川殷忠”与《汉书·儒林传》“广川段仲”，应是同一人。

② 清人凌曙《春秋繁露注序》曰“自高至寿，五叶相承，师法不坠。寿乃一传而为胡毋生，再传而为董仲舒”，以董仲舒为胡毋生的弟子。

③ 王和：《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传》是以“问难”的形式解经，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予以回答。这种解经形式有利于发挥解释者的主导作用。最后，《公羊传》以《春秋》文本为对象，而不是借解释来阐发和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

《公羊传》解释《春秋》的内容有四：

其一，名物制度的训释。《公羊传》成立的时代与《春秋》相距较远。《春秋》所记的典章制度渐渐失传，故《公羊传》重视对周之典章、礼乐制度的诠释。《公羊传》隐公元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这是说明周代宗法的嫡长子制。《公羊传》隐公元年“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这是对周之丧事名物的解释。

其二，历史事实的补充。《左传》以史传经，对《春秋》标题式的记事详加叙述；《公羊传》以义传经，重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是，《公羊传》也注意补充历史事实，其中比较详细地叙述历史事件的传文有 50 余条，其他传文也或多或少地记录了部分史实。因为《公羊传》亦知道义从事出、书法依据史实，离开了具体的历史事实而仅以书法言义乃是空言说经。赵生群教授说：“解释经文，不能离开史实。《公羊》、《穀梁》两传的作者也深明其理”，“《公羊传》大约有 570 条，《穀梁传》大约有 750 条。两书虽不像《左传》那样以补充事实为主，但大多数条目都涉及史实或与史实有关联”^①。

《公羊传》的成书或较《左传》晚，因而历史事实不清，或不录，或简录，或运用文学性的手法叙述得生动传神。例如《春秋》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

《左传》僖公二年：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官之奇存焉。”对曰：“官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暱之。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軫，伐郑三门。冀之既

^① 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3 页。

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官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

《公羊传》僖公二年：

虞，微国也，何为序乎大国之上？使虞首恶也。何为使虞首恶？虞受赂，假灭国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赂奈何？献公朝诸大夫而问焉，曰：“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其意也何？”诸大夫有进对者曰：“寝不安与？其诸侍御有不在侧者与？”献公不应。荀息进曰：“虞郭见与？”献公揖而进之，遂与之入而谋曰：“吾欲攻郭，则虞救之；攻虞，则郭救之，如之何？愿与子虑之。”荀息对曰：“君若用臣之谋，则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尔，君何忧焉？”献公曰：“然则奈何？”荀息曰：“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则宝出之内藏，藏之外府；马出之内厩，系之外厩尔，君何丧焉？”献公曰：“诺。虽然，官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官之奇，知则知矣。虽然，虞公贪而好宝，见宝，必不从其言。请终以往。”于是终以往。虞公见宝，许诺。官之奇果谏：“记曰：‘唇亡则齿寒。’虞郭之相救，非相为赐。则晋今日取郭，而明日虞从而亡尔，君请勿许也。”虞公不从其言，终假之道以取郭。还，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宝牵马而至，荀息见曰：“臣之谋何如？”献公曰：“子之谋则已行矣，宝则吾宝也，虽然，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夏阳者何？郭之邑也。何为不系于郭？国之也。何为国之？君存焉尔。

《公羊传》的文学性叙事首先表现在叙述更为细致生动，文字量比《左传》大；其次是运用对话的方式，人物的语言富有个性化，生动传神；再次，“唇亡则齿寒”的譬喻以及献公之戏言，生动而富有情趣。

其三，《春秋》书法的归纳和揭示。《春秋》书法，即《春秋》笔法，是《春秋》记事的规则。《公羊传》认为，《春秋》有书法，书法蕴涵着褒贬是非

的评价以及《春秋》大义，且书法是隐晦的。^①

其四，《春秋》大义的阐发。这是《公羊传》解释《春秋》的主要内容。名物制度的训释、历史事实的补充、书法的归纳和揭示，最终皆指向《春秋》大义的阐发。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君子何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欤？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欤？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②

君子（即孔子）作《春秋》，以尧、舜之道为依据（君子乐道尧、舜之道），而制《春秋》之义。《春秋》之义是儒家关于王道政治的思想，为后圣所取法。这构成了《公羊传》解释《春秋》的理由之一。

《春秋》昭公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曰：

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即孔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③

“《春秋》之信史也”，表明孔子尊重历史事实。“其词”，即《春秋》记录历史事实之辞。“其词则丘有罪焉耳”，孔子在《春秋》之辞中寄寓了“其义”，即“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孟子·离娄下》），但《春秋》之辞蕴涵的

① 傅修延教授归纳“《春秋》笔法”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是寓褒贬于动词；二是示臧否于称谓；三是明善恶于笔削；四是隐回护于曲笔。参见《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184页。

② 本文征引《公羊传》的文字，根据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这与《孟子·离娄下》一段文字大略相同：“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笔者认为，《孟子》本于《公羊传》，一是因为《公羊传》的成书时间早于《孟子》，二是因为《孟子》这段话更有理论性和系统性（其事、其文、其义）。